

科学诉求与人文视域

——任鸿隽科学文化思想研究

侯春燕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科学诉求与人文视域

——任鸿隽科学文化思想研究

侯春燕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科学诉求与人文视域 : 任鸿隽科学文化思想研究 /
侯春燕著. --太原 : 三晋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5457-0532-4

I. ①科… II. ①侯… III. ①任鸿隽(1886~1961)
- 科学思想-思想评论 IV. ①K8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7265号

科学诉求与人文视域 : 任鸿隽科学文化思想研究

著 者: 侯春燕

责任编辑: 薛勇强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8(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慧致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4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0532-4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序

新时期以来,任鸿隽对于许多人来说,已是耳熟能详:他是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的主要创建者,曾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北京大学教授、四川大学校长等职,为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重要倡导者、组织者;与此同时,他还是近代科学救国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此等等。这些自然都是对的,但是,要想进一步理解任鸿隽,还需将他的思想置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以来,西方现代思潮的变动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演进及其交感的时代语境下加以考察,才能看得更清楚。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尤其是欧战后,缘于战争的创深痛钜与社会矛盾的充分暴露,欧人愈益反省西方近代的资本主义文明。除了马克思主义主张社会主义革命论外,许多人则认为,文艺复兴以来理性主义盛行,造成了机械的人生观,迷信“科学万能”,物质至上,以至于人欲横流,精神家园因之荒芜,这是引发欧战悲剧的根本原因。他们也因之强调精神生活,主张恢复和重建人的情感世界。以尼采为代表反省现代性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缘是兴起,西方现代社会思潮发生了深刻的变动。这股反省现代性思潮,因梁启超、梁漱溟和张君勱诸人的推动,在其时的中国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新文化运动后期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争,其更为核心与深层次的问题,也恰在于人类现代文明面临的共同性问题:如何看待与正确处理理性与直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科学与人文的彼此关系?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主持者,效法西方近代文明,积极倡导科学与民主,固然代表了社会思潮发展的主流;但于西方现代思潮的变动却甚少措意,而固执于“科学万能”论,拒绝反省现代性和轻率贬抑甚至抹杀哲学与人文的价值,却又不免失于一偏。陈独秀说:“现在只应该专门研究科学,已经不是空谈哲学的时代了。西洋自苏格拉底以至杜威、罗素,印度自邬婆尼沙陀大师

以至达哥尔,中国自老聃、孔丘以至康有为、章炳麟都是胡说乱讲,都是过去的梦话,今后我们对于学术思想的责任,只应该把人事物一样一样地分析出来不可动摇的事实来。我以为这就是科学,也可以说是哲学。”^①胡适在《哲学的将来》一文中也说:哲学将被“根本取消”,因为“科学不能解决的,哲学也休想解决,即使提出解决,也不过是一个待证的假设,不足于取信现代的人”。^②所以,其后发生的著名的“科玄之争”,并非传统所谓的新旧之争;说到底,乃是上述西方现代思潮变动在中国引起的强烈反响。

当任鸿隽于1918年将中国科学社由美国迁回中国,并决心全力推进自己科学救国的抱负时,他发现自己必须兼顾西方现代思潮变动与中国既有国情双重的语境。后来事实证明,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科学救国论者,他较许多人更加冷静与坚定地把握住了在中国宣传与推进科学,必须坚持的正确思想方向:科学与人文并重。早在1919年3月,他就曾在《新青年》第6卷第3号上发表《何为科学家?》一文指出,科学与哲学如同亲兄弟,同等重要,不容对立,否则:“在一家里,就要起阅墙之争,在学术上,就不免偏枯之虑。”^③在“科玄之争”中,他的文章《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既批评张君劢低估了科学的作用,但同时也明确表示不赞成丁文江的“科学万能”论。他说,科学有自己的限度,在人生观问题上也是如此。“张君是不曾学过科学的人,不明白科学的性质,倒也罢了,丁君乃研究地质的科学家,偏要拿科学来和张君的人生观捣乱,真是‘牛头不对马嘴了’”。他最后的意见是:“人生观的科学是不可能的事,而科学的人生观却是可能的事。”所以,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我们应该多提倡科学以改良人生观,不当因为注重人生观而忽视科学。”^④他坚持了科学的价值,更坚持了科学的良知,这显然与胡适诸人大相径庭。也正因如此,他被坚持“科学万能”论的陈独秀说成是暗中投降了玄学鬼。在其后长期的科学宣传中,任鸿隽没有忘记将科学与人文是相得益彰的亲兄弟的思想贯穿始终。不仅如此,经二战的再教训,他更加清醒和自觉地再次将问题提高到了反省现代性的

① 《答皆平》,《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127页。

② 《胡适全集》第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8页。

③ 《任鸿隽文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84页。

④ 《人生观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任鸿隽文存》,第303、306页。

层面。他说:科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久已存在,何以到欧战后成了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这是因为,“唯有到了二十世纪以后,西方的帝国主义已扩张势力到短兵相接的程度,社会上财富增加,阶级组织日益繁复,于是战争、经济恐慌等现象接踵而起。在这些生存竞争的过程中,科学都占了一个重要地位。科学家在这个时候,才回过头来检讨一下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不消说是当然,我们还有来何晚也之感”^①。要看到,正是由于兼有了这样的思想支点,任鸿隽的科学救国思想,不仅能够超越急功近利,也超越了狭隘的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展现了真正科学家的良知与广阔胸怀。

上世纪五十到六十年代,英国学者查尔斯·斯诺鉴于自然科学家与人文学者间存在隔膜,提出了自己著名的“两种文化”说,并主张融通二者,以形成“第三种文化”。这引起了学界普遍的关注。随后,又有“科学文化”概念的出现。这些都反映了人们对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的忧虑,表达了渴望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实现融通,以避免彼此失之偏枯而不利于社会健全发展的良好愿望。如果我们注意到当年以尼采为代表的反省现代性思潮,正是当下西方风行一时的后现代主义的前驱;那么,我们便不难理解,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现代社会思潮的变动也正是缘其传统,表现为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非理性主义)、追求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两大思潮间的不断冲撞与搏击,而其张力恰构成了现代社会发展深刻的内驱力。这些无可避免地、深刻地影响到了当今的世界。故所谓融合“两种文化”以成“第三种文化”或叫“科学文化”,其良善的愿望与取向,实可视为人类现代社会思潮变动中的应有之义。缘此以进,也不难理解,任鸿隽从决心献身科学救国事业那天起,他的科学宣传与主张,便体现了既立足国情,又不脱离现代社会思潮发展大趋向的可贵自觉。任鸿隽的可贵与成功之处在于斯,更好地理解他的思想发展,也应当缘于斯。

本书《科学诉求与人文视域——任鸿隽科学文化思想研究》,是侯春燕同志在她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当年学界有关任鸿隽的研究还甚为寂寥,相关资料也远未整理。作者在确定论文选题时,有意避开了诸如“中国科学社研究”这样的题目,而选择了研究任鸿隽的科学文化思想,正是有感于借助“两种文化”与“科学文化”的视角,最足以彰显其科学思想主轴与精彩的特

^① 《科学与社会》,《任鸿隽文存》,第617页。

色。如她在书中所说：“任鸿隽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科学教育背景，使其科学文化思想兼容了中国人文精神与西方科学精神的精华。他从人文的角度阐释科学的性质和作用，并以科学的态度和理性精神关注中国的文化和社会改革，为两种文化的沟通与融合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所有这些表明，他应该算是近代中国‘科学文化’领域的先驱人物。”作者的选题富有创意，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书在充分肯定了任鸿隽为中国“科学文化”研究领域先驱者的基础上，系统考察了他的科学救国思想的方方面面，包括“科学与国运”、“科学认知的深化与科学传播”、“科学体制之探索”、“科学教育思想”等等。作者用力甚勤，全书资料翔实，视野开阔，持论也较平实，不乏独立的见解。如作者写道：“任鸿隽的科学救国理想，是欲在科学高度体制化和科学研究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利用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振兴实业，启迪民智，健全人格，匡正时弊，力挽国运。也就是说，如欲从根本上扭转国运，就必须注重科学自身的发展。相对而言，陈独秀、胡适等更为看重由科学衍生出来的伦理、社会和政治改革蕴意，而不甚措意于科学知识和科学研究本身。二者对科学与救国关系的不同体认，使他们赋予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不同的功能，从而使得二者在科学救国的道路上，有时携手而行，有时又不得不保持着距离。”实际上，上述在“科玄之争”中，任鸿隽与胡适诸人求同存异的立场，业已印证了作者的这一论点。

近年来，学界相关的成果虽然渐多，但系统研究任鸿隽科学文化思想的专著，尚付阙如。本书的出版进一步丰富了任鸿隽的研究，同时也丰富了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

注意将任鸿隽的科学思想置于近代社会历史发展大背景下加以考察，避免就事论事，这是本书的一大优点；由于学界对于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中，这也决定了对任鸿隽思想的研究，仍有许多有待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在本书出版之际，为作者贺，同时也对作者抱新的期待。

是为序。

郑师渠

2012年1月28日
于北京师范大学

目 录

序	(1)
绪论	(1)
一 缘起	(1)
二 学术史	(6)
三 资料·方法·思路	(16)
第一章 “科学文化”视域	(19)
第一节 “科学文化”之界说	(19)
第二节 任鸿隽对“科学文化”的早期探索	(23)
一 科学文化思想渊源	(23)
二 从文化的角度阐述科学	(29)
第三节 科学文化视野下的文化和社会革新主张	(37)
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稳健态度	(37)
二 蕴有科学精神的社会改良主张	(40)
第二章 科学与国运	(43)
第一节 任鸿隽科学救国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43)
一 近代科学救国思想的发展历程	(43)
二 从革命救国到“科学救国”	(46)

三	科学救国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50)
第二节	科学与国运关系的探讨	(56)
一	科学对实业发展的推动	(56)
二	科学对社会政治的促进	(59)
第三节	任鸿隽科学救国思想之审视	(63)
一	“科学”与“救国”关系之体认	(63)
二	殊途同归的科学救国与革命救亡	(70)
第三章	科学认知的深化与科学传播	(75)
第一节	“吾国无科学之原因又安在乎？” ——“李约瑟难题”的先声	(75)
一	“李约瑟难题”及其影响	(76)
二	“李约瑟难题”的先声及回应	(78)
第二节	“整个科学”的观念	(87)
一	纠正对科学的误解	(87)
二	阐释科学内涵	(91)
三	提倡科学方法	(94)
四	弘扬科学精神	(99)
第三节	科学传播的努力	(102)
一	营造科学界内部传播与交流的环境	(102)
二	搭建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间沟通的桥梁	(106)
三	呼吁科学普及与公众参与的互动传播	(111)
第四章	科学体制之探索	(115)
第一节	任鸿隽关于科学研究的思想	(115)
一	力行研究论	(115)
二	应用科学与纯粹科学研究并重	(119)

三	地方性与世界性科学研究兼顾	(127)
第二节	科学研究体制化的努力	(134)
一	培养科学人才与建立科研组织孰先孰后的认识	(135)
二	创建科学社与科学体制化的早期探索	(141)
三	论科学自主性	(149)
第五章	科学教育思想	(154)
第一节	任鸿隽与科学教育思潮	(155)
第二节	“科学教育化”和“教育科学化”	(164)
一	以科学育精神	(164)
二	专才教育与通识教育之间	(169)
三	教育方法的科学化	(177)
四	教育组织和管理的科学化	(188)
第三节	教育独立诉求下的反对党化教育主张	(196)
一	崇尚学术自由,主张教育独立	(196)
二	呼唤健全人格,反对党化教育	(203)
结语		(208)
参考文献		(216)
后记		(228)

绪 论

一、缘起

任鸿隽的夫人陈衡哲在其《任叔永先生不朽》一文中曾说：“任君在立德、立功、立言的三方面，是却（确）有了不朽的地位的。”^①考察任氏一生可知，陈氏此言并非溢美。

任鸿隽，字叔永，间以“永”或“隽”为笔名发表文章。1886年12月，出生于四川省垫江县（今属重庆市），祖籍浙江吴兴县。其父母均是幕友世家出身。幕友系指专为官场承办文牒者，因在外为幕者多为浙江绍兴和吴兴人，也称绍兴师爷。由于幕友职业需要较高的文化修养，他的家庭虽穷而不废读，素有无论男女，六岁均要上学的家规。严格的家庭教育为他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基础，积累了良好的人文素养，其日后科学文化思想的形成与此不无渊源。

在他的青少年时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民族矛盾急剧激化，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日益危殆，中西两种异质文化始终处于相激相荡、相交相融的潮流之中。面对亘古未有之奇变，先进的知识分子深刻反思传统文化，积极鉴用西方文化，努力探寻救亡之路。这种成长环境，无疑为任鸿隽的思想转变提供了契机。他无意科举，慕求新知，毅然于1904年进入重庆府学堂学习新学。中学毕业后，他曾以教书为手段积攒游学经费。1907年，他就读于民主气氛浓厚的中

^① 陈衡哲：《任叔永先生不朽》，樊洪业、张久春选编《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以下简称《文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748页。

国公学。在那里,他不但接受了新式教育,而且结识了革命党人但懋辛和朱芾煌等人,思想转向革命。1908年任鸿隽留学日本,次年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学习应用化学,并在课余师从章太炎学习国学。受救亡图存思潮的感召,他积极投身于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活动,为革命党人联系军火,印制布告。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毅然抛弃学业,匆匆“回向革命战争正在澎湃进行的祖国”^①。1912年1月1日,开始在南京临时政府秘书处任职,满腔热忱地草拟文稿,并积极推动公文书式的改革。南北议和后,他深切地感到,政体的变革绝非意味着社会问题的全部解决,毅然放弃北上为官的盛邀,赴美留学,以期为将来国家储才备用。在等待出国期间,他曾在京津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意报》报馆供职数月。他不畏时忌,将朱芾煌记述袁世凯窃权过程的日记,以《共和建设别记》为题在该报连续登载。然而刊载未及一半,即被忍无可忍的袁世凯设法禁止,《民意报》亦被勒令停刊。可见,追求进步、心仪革命,是任鸿隽此期思想的显著特征。

1912年冬,任鸿隽终于如愿以偿,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继续深造化学。作为一个国学根底比较深厚,并较早直接熏染于西方科学的留美学生,他对中西文化的长短优劣,有着切肤之感。他认为中西最大的差别在于科学的有无,为此,他于1914年夏,与同时留美的胡适、杨杏佛等同仁一道,在美国创建了《科学》杂志和科学社。次年,《科学》月刊正式公开出版,它是中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杂志;科学社则正式改组为中国科学社,它是中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文化团体。此后,《科学》和科学社便成为其终身魂牵梦萦的事业。在《科学》创刊号上,他率先擎起了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发出“科学救国”的呼唤;同时发表了《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认为“无归纳法为无科学之大原因”^②,因而被当今学术界视为中国“李约瑟难题”的最早提出者。他为《科学》撰写了“缘起”和“发刊词”,并为其无偿编撰文章,宣传科学;为中国科学社起草“社章”和确立宗旨,并设法为其争取道义和物质援助。1916年大学毕业后,他又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

① 任鸿隽:《前尘琐记》,《文存》,第707页。

② 任鸿隽:《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文存》,第21页。

化学工程硕士学位,并于1918年毕业后归国。他长期担任中国科学社理事会理事和社长职务,在以他为首的科学社领袖群的领导下,分社和社员数目与日俱增,研究事业蒸蒸日上,近代中国的科学体制初步形成。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与中国近代科学事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该机构成立于1924年,其职能是保管和处置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并以之赞助中国的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从1925年起,任鸿隽长期供职于中基会。历任专门秘书、执行秘书和副干事长,尤其在1929—1935年、1942—1949年期间,两度担任干事长,成为中基会的实际主持人。他充分利用中基会有限的财力,设立和资助科研机构,兴建北平图书馆,资助重点大专院校,派遣留学生,为学有所成的科学家设置研究教席,为在科研方面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设置研究补助金和奖励金,培养了一批科学人才。在他的积极努力下,中基会由庚款保管机构转为科学事业的推动机构,并在庚款停付之后仍能得以延续原有之事业。任鸿隽在中基会供职期间,对中国近代科学和教育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陈衡哲也称,在任鸿隽的各项事业中,“尤以中基会为最能使他发展其对于科学的抱负与贡献”^①。

中央研究院的成立是中国近代科学体制真正形成的重要标志。1927年,中华民国大学院成立,并附设中央研究院。1928年,中央研究院改为独立机关,成为全国最高科学研究机构。任鸿隽利用中基会基金对其给予积极赞助,并担任了院内的行政职务。1927年,任大学院科学教育委员会委员。1938年,任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继任总干事长,协助蔡元培处理院务。由于蔡元培年高多病,任鸿隽实际承担了院内的全部事务。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下,他依然联合昆明各学术机关筹建联合图书馆,开展“中央研究院奖金征文”活动,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战时工作。1940年7月,由他筹建的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实验馆在昆明落成。由于他一向反对一人兼任多职,同年10月,将干事长一职移交于傅斯年,1942年,又辞去化学研究所所长职务,专任中基会干事长。虽然他在中央研究院的任职时间较为短暂,又处于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之中,但他还是恪尽

^① 陈衡哲:《任叔永先生不朽》,《文存》,第747页。

科学诉求与人文视域——任鸿隽科学文化思想研究

职守,兢兢业业,为推进研究院的科研事业付出了最大努力。

任鸿隽也曾投身于教育领域,而且对教育不乏“富于价值的意见与贡献”^①。1920 年在北京大学教授化学,1921—1922 年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1923—1925 年担任国立东南大学副校长,1935—1937 年任四川大学校长。1915 年,他发表了《科学与教育》一文,举起了科学教育的旗帜。1932 年,他连续撰写了《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和《再论党化教育》两文,强烈指责国民政府倡行的“党化教育”。他还立足学术,推进四川大学的现代化和国立化,为川大的革新和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任鸿隽晚年仍在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奔波不已。1949 年 5、8—9 月,^②他两次往返于香港,并在把中基会事业交接完毕后,立即返回了大陆,投入到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建设之中。5 月,他组织中国科学社等四科学团体,联合向党和人民政府倡议召开中华全国自然科学者代表大会。次年 8 月,会议顺利召开,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之后,他组织举办了一系列的学术讲座和座谈会;主办了“中国科学史料展览”,并主编出版了《科学史料译丛》;将停刊多年的《科学》以季刊形式在上海复刊。1958 年,他担任了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市科协副主席职务。最为重要的是,在他的主持下,中国科学社将其所属的《科学画报》、生物研究所、明复图书馆和图书仪器公司等事业,陆续捐献给了国家。1961 年 11 月,他因心脏衰竭而逝世。

由上可知,任鸿隽是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科学界与教育界前排就座的人物。从近代中国科学文化团体的建立、科学救国思潮的涌动、科学教育思潮的兴起和现代中国科学体制化进程的发展,到五四“科学”与“民主”口号的提出、“科玄论战”的展开,以至“李约瑟难题”的提出和“要把科学当作国策”的呼吁,二十世纪的许多历史文化事件,都与任鸿隽的名字紧密相连。

① 陈衡哲:《任叔永先生不朽》,《文存》,第 747 页。

② 任鸿隽的次女任以书在 1949 年 9 月 9 日的日记里写道:“爸爸四号自香港乘船北返了,一星期可抵天津,要先上北平赴‘新政协会议’(以无党派,科学家身份)。”参见周振鹤:《到底有人想起了他——读〈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文汇报》,2003 年 2 月 14 日第 15 版。

时至今日,科学哲学界、教育界和史学界从未停止过对如下相关问题的思考:近代科学何以没有在中国产生;应用科学研究与基础科学研究孰轻孰重;科学本土化与世界化的关系如何正确理解;科学的独立自主与国家的政策调控之度如何把握;建立健全科学研究运行机制的重要性;教育科学化与科学教育化如何实现;教育体系中如何实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和谐统一;科学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何在;科学启蒙与政治救亡之间的关系如何,等等。本文试图从文化史的角度,参酌科学哲学和教育学的研究方法,观照和研究任鸿隽的科学文化思想。相信这种努力,至少可以使今人在探究和思考上述问题时,因为融入历史的智慧而愈形深邃。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任鸿隽对科学事业的执著追求,并未使他盲目地崇拜科学的功利价值,而是着意发掘科学的人文蕴涵,力图用科学的方法与精神促进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他在科学与人文两极对峙中所进行的不乏睿智、颇有见地的折中与整合,是很值得我们在研究思想文化史时驻笔和彰显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以来,国际学术界围绕著名的“斯诺命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关于“两种文化”的思想论战,并对融通两种文化的“第三种文化”进行了探索。进入九十年代后,“两种文化”问题受到了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科学哲学界,学者们提出了一个特定名词——“科学文化人”,用来指称那些曾经和正在致力于沟通“两种文化”的人。鉴于任鸿隽的思想特征,他们认为,任鸿隽就是那个时代的“科学文化人”。那么,任鸿隽在“科学文化”方面作出过哪些贡献?他对“科学文化”的探索于当今有何启发?本文试图从融合“两种文化”的角度,深入探讨任鸿隽的科学文化思想。相信这一研究,能够助益于至今依然困扰人们的现实问题的解决。

总之,任鸿隽在积极开拓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过程中,对科学启蒙和促进“两种文化”的融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科学启蒙和“科学救国”思潮,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两种文化”问题“是哲学家、历史学家

科学诉求与人文视域——任鸿隽科学文化思想研究

和社会学家通常思考的那类问题的延伸”^①，需要多种学科的学者共同参与。因此，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任鸿隽的科学文化思想，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学术史

任鸿隽及其同仁，如胡适、丁文江、杨杏佛、赵元任、翁文灏等，被目为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开拓者或先驱领袖。在他们的倡导和努力下，西方近代科学得以引入中国，并渐次实现本土化。目前，有关丁文江、胡适、翁文灏等人的生平业绩及其思想贡献，均有专著论及，而作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科学界和教育界的班头人物”^②、“提倡近代科学思想的先锋”^③的任鸿隽，却未受到应有的关注。下面仅对与他有关的论文成果作一简要回顾与总结。

关于任鸿隽的研究，可以《任鸿隽文存》的出版为界分成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零散浮泛的，主要侧重于他的生平业绩；后一阶段虽然成果密集、视角多维，但是在严密性、思想性和系统性方面还有较大空间。不过，也就是这些成果，为笔者提供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线索和难得的考察视角。

（一）《任鸿隽文存》出版以前的研究状况

第一，较早论述任鸿隽的文章，多是近人对其生平业绩的片断回顾与简略评述。1974年，时值中国科学社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台湾学者陶英惠撰写了《任鸿隽与中国科学社》^④一文。该文以时间为经、以传主的主要社会活动为纬，简要勾勒了任鸿隽的一生。从在四川接受传统教育到留日、留美接受科学熏陶，从发起中国科学社到服务中基会，从献身教育工作到主持中央研究院事务，从担任临时政府秘书到参加国民参政会，面虽较广，但限于篇幅和特定的写作意

① C. P. 斯诺著，陈克艰、秦小虎译：《两种文化》，斯蒂芬·科里尼之“导言”，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1月版，2-3页。

② 樊鸿业：《任鸿隽：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拓荒者》，《自然辩证法通讯》，1993年第3期。

③ 杨翠华：《任鸿隽与中国近代的科学思想与事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上册，1995年6月。

④ 陶英惠：《任鸿隽与中国科学社》，《传记文学》第24卷第6期。

图,只是重点着墨于任鸿隽的生平事迹,而对其科学文化思想未及展开论述。然而,该文可谓开启了任鸿隽研究的视窗。1975年,《传记文学》刊载了阮毅成的《任鸿隽先生与中公复校》^①一文。中国公学建于1905年,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后停办。1947年,同为中国公学学员的阮毅成与任鸿隽曾经酝酿复校事宜。文章回顾了他们之间的交往过程及任鸿隽、胡适对复校的不同态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任鸿隽为人处世的风范。樊鸿业的《任鸿隽胡适过从录》^②,则以二人的三次同校生涯(中国公学、康内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在中国科学社和中基会工作的相互提携及在创办《努力周报》、《独立评论》时的共同立场为叙述轴线,牵引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几个重大事件,诸如由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文学革命与西式标点符号及排版格式的引进、整理国故运动与科技史的整理、反科学思潮与“科玄论战”等。通过任鸿隽与胡适在这些事件中的态度与立场,说明两人在文学、哲学和政治上的思想关联。

第二,在对任鸿隽的研究中,用力较多的是传记。1986年任鸿隽一百周年诞辰之际,张孟闻发表了《任鸿隽先生传略》^③一文。该文体例虽与陶英惠之文并无二致,但其关于任鸿隽支持共产党外围组织争取民主活动的记述,颇具史料价值。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关于任鸿隽的研究终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由赵慧芝撰写的《任鸿隽年谱》^④,第一次较为详细地记述了任鸿隽的人生轨迹。1993年《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又收录了赵慧芝撰写的《任鸿隽》^⑤一文。年谱与评传意在理清任鸿隽的生平,并概述其在科学、教育和文化等事业方面的成就与贡献,但因体裁所限,两文对任氏思想的形成背景与时代意义未及展开论述,其功要在爬梳资料,从而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尤其是年谱的问世,不仅收录了蕴藏在任鸿隽往来书信和公文、简报中的宝贵思想资料,还

① 阮毅成:《任鸿隽先生与中公复校》,《传记文学》第26卷第3期,1975年。

② 樊鸿业:《任鸿隽胡适过从录》,《胡适与他的朋友》,纽约天外出版社,1990年版。

③ 张孟闻:《任鸿隽先生传略》,《科学》第38卷1期,1986年1月。

④ 分别发表于《中国科技史料》1988年第2、4期和1989年第1、3期。

⑤ 赵慧芝:《任鸿隽》,《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编、化学卷1,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